

# 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资本效应研究

周阳敏,李 硕,轩会永

(郑州大学 商学院,郑州 450000)

**摘 要:**阐述新型城镇化的新思路,指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将成为新型城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研究切入点,结合河南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情况,运用社会资本理论解释说明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农村的影响。发现新型城镇化在微观层面通过产业带动,促使农民工返乡临近就业,显著地缓解“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中观层面上通过拉近、扩展、强化邻里关系,增强了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互惠和规范作用;宏观层面上通过空间集聚,大大增加了居民的公共领域及其利益交叉,进而增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这是结合社会热点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全新运用,丰富深刻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作用,揭示了新型城镇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重构效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帮助政府发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和漏洞,完善制度等,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1;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3)05-0001-07

## 一、问题提出

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这是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城镇化列入 2013 年 6 项工作重点,城镇化战略被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城镇化,并不是新提法,但承载着新使命。李克强总理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性。李克强<sup>[1]</sup>指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新型城镇化的热潮正在席卷着整个中国。

新型城镇化被社会各界寄望于拉动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它蕴含了中国未来变革的诸多要素:土

地、户籍、财税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造城、移民,而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目前,在河南全省启动的新型农村社区试点近两千个,初步建成约四百个,共同的目标都指向了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农村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前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sup>[2]</sup>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到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同的高度,称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发展的“第二次革命”。河南先后涌现了一批先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典型,如滑县锦和新城社区、辉县南李庄社区、辉县裴寨社区、浚县中鹤新城社区、舞钢市瑞祥社区、沈丘县老城镇西关社区、长葛市石象乡古佛寺社区等等。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农民就地市民化成为当前新型城镇化的热点和新思维,也是新型城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民营经济来说,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是他们大显身手的重要契机。那么,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切入点的新型城镇化效果如何?新型城镇化将会给广大农村社会和民营企业

**收稿日期:**2013-08-18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3B314);河南省工商联重点调研课题招标项目(HNGSL-2013-01)

**作者简介:**周阳敏(1971-),男,重庆市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

**网络出版时间:**2013-09-02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30902.1051.001.html>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文章试图根据对河南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调研情况,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制度资本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

## 二、文献回顾

### (一)对新型城镇化内涵和制度改革的研究

辜胜阻<sup>[9]</sup>认为新阶段的城镇化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注重人的城镇化,解决进城农民工市民化;二是注重城镇化质量,强调要坚持“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八字方针;三是注重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防范“大城市病”,发展城市群与中小城市,趋利避害,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陈锡文<sup>[10]</sup>指出城镇化是个自然的过程,主导因素是市场,政府的责任在于保持农村和城市的平衡,使得农业得到发展、农民得到实惠,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刘海平<sup>[11]</sup>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从价值取向上看,以“以人为本”为发展目的,以社会公正为价值导向,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和谐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从发展状态和表征上看,民生得到保障和改善、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能够安居乐业;从运作的科学性来看,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有领导、有规划和有计划,将政府的自觉能动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从本质上看,新型城镇化是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以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为引擎,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乡两个系统在经济、科技、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空间等诸多基本要素协调发展优化组合的过程。很多学者相继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政策,土地政策,户籍改革等做出了一系列研究,并且针对各省各市的问题,进行单独剖析,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许经勇<sup>[12]</sup>分析了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关系相辅相成,中国户籍制度与土地的现状即处于人地分割的状态,他认为中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应同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即实现全国城乡户籍一元化。对土地制度的改革应加强未被利用的土地供应,让包括农村建设用地在内的所有土地平均进入市场。童潇<sup>[13]</sup>则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镇管社区”的方式进行了优化:一是撤镇变街;二是强镇扩权,相对来看,近郊镇、经济弱镇宜选择前者,而远郊镇、经济强镇则宜选择后者。

### (二)对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和主力军的研究

就城镇化的道路研究,费孝通早在1983年就提出“小城镇,大问题”,提倡通过发展小城镇来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但有的学者却对此提出质疑。90年代以后对城镇化道路的研究主要有:(1)大城市论。王小鲁、夏小林<sup>[14]</sup>认为,规模较大的城市具有明显的聚集效应,

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带来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大的外部扩散效应。杨波、朱道才、景治中<sup>[15]</sup>从城市化发展阶段角度,分析认为,我国总体仍处在城市化前期阶段,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大城市。(2)小城镇主导型的城市化。我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遵循“乡镇工业→乡村工业化→小城镇→乡镇(人口)城市化”的模式,以乡镇工业化带动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胡俊生、胡少维指出无论从发展经济还是开拓市场的角度来说,增加农民需求都是扩大国内需求的关键,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减少农民,所以“发展小城镇就成为必然的选择”。(3)进入21世纪以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论逐渐成为主流。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城、乡协调、同步的双轨制(陈光庭,聂高民,2008)。潘海生、曹小锋<sup>[16]</sup>,通过对浙江省小城镇建设的调查,指出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客观必然性。所谓“就地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以中小城镇为依托,通过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发展社会事业,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厉以宁<sup>[17]</sup>指出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具体应包括三部分:其一是城市老城区改造,通过工厂外迁形成商业区、服务区;其二是工业新区,通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将成为未来的新经济增长点;其三是农村新社区,指靠近城镇的农村社区建设,现在还都是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它们不仅吸引了农民前来,更重要的是引导农民向城镇化的路走,向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走。他认为,告别“农民进城才是城镇化”的思维模式,要把农村建设成新社区,新社区就是城镇化的一部分,这样可以避免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带来的弊端。辜胜阻表示,我国要建更多的城市群,让中小城市有吸引力,实现本地城镇化,可以减少城镇化的巨大代价。到目前为止,对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的争论仍然没有结果,专家学者各执一词。早期遵循大城市发展道路,人口大量涌入资源集中的大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使城市不堪负重,问题频发。“就地城镇化”模式逐渐成为主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为新型城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对于新型城镇化的主力军,社会各界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厉以宁认为于民营经济来说,目前最好的投资机会就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民营企业可以考虑参与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与管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sup>[18]</sup>在全国工商联会议上指出,民营企业是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民营经济是小城镇解决就业、改善民生、提高百姓收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应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主力军作用。

目前国内对新型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

制度改革和发展道路等宏观层面,新型城镇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方面少有研究。文章以河南新型城镇化的具体情况和对河南部分地市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实地调研资料为依据,从微观主体出发,分析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社区居民的影响,试图揭示新型城镇化对中国乡村的社会资本效应。

### 三、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资本效应

#### (一) 社会资本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诸种资源之一,存在于家庭关系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中。社会资本的概念一经提出,引起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广泛深入研究,专家学者纷纷用社会资本概念来解释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社会资本的广泛应用,一方面表明社会资本具有跨学科性,而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多学科、多角度的应用使得社会资本成为争议最多的概念和理论之一。

社会资本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中。他强调社会资本是一个群体特征,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并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以微观和宏观的联结为切入点对社会资本做了较系统的研究。他把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叫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是某些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他指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存且可以相互转换。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在科尔曼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并把其引入政治学研究中。根据帕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是一种团体的甚至国家的财产,而不是个人的财产。帕特南(Putnam)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提出公民参与网络,将社会资本的应用进一步扩展到更大规模的民主治理研究中。林南(Nan Lin)在对社会资源理论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他认为社会资源仅仅与社会网络相联系,而社会资本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

国内学者也对社会资本做了深入研究,边燕杰<sup>[1]</sup>是从微观个体层面上研究社会资本的,他从三个层次来阐述社会资本:第一层次的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关系,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与社会资本存量

成正相关,越多的社会网络关系会带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存量;第二层次的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结构,一旦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形成网络结构,这种高密度的社会网络会形成一种团体规范,而且为个人带来高效搜索和强力控制的优势;第三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是围绕个人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个人所处的位置,最终表现为借此位置所能发动和借助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根据以上回顾,可以发现虽然学者们研究社会资本的切入点和应用领域不同,但仍存在共识点:社会资本通过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其本质是这种关系网络所蕴含的资源。

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的变迁时期,原有的依靠国家行政权力分配社会资源的方式趋向弱化,市场交换关系配制资源的方式又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此时,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关系(社会资本)也会成为建立和维护信任关系,进行交换和寻求支持的基本形式。尤其是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势必给中国的乡村社会带来“剧变”,我国乡村传统的社会资本属于局限于家庭、宗族内部的传统血缘依附型,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产生对权威的服从依附心理、官本位意识、清官意识和个人崇拜等等,因而不利于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转型。目前,对新型城镇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的研究虽少却不容忽视,本文试图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资本效应。

笔者分三个层次来研究新型城镇化对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效应。微观层面主要是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居民家庭的社会资本效应;中观层面分析新型城镇化对邻里的社会资本效应;宏观层面分析新型城镇化对社区管理的社会资本效应。

文章的数据来源有三部分:第一,由河南省工商联提供的各地市上报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材料,主要内容包括社区人口规模、占地规模、节约土地、人均收入、投资主体、建设模式、补偿情况、管理模式等;第二,经河南省工商联网站和中国经济管理网发布的新型农村社区居民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年龄、文化水平、收入来源、是否适应社区生活、社区环境、邻里关系、社区秩序、社会福利、家庭幸福指数、邻里和谐指数等;第三,笔者所在调研组,赴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延津县和平顶山舞钢市,实地调研了5个新型农村社区,与社区管理人员、参建企业负责人进行座谈,深入社区居民家中了解社区情况。

#### (二) 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资本效应研究

##### 1. 社区生活的满意原因分析

将社区生活10个满意指数分为5个等级(9-10:

非常满意;8-9:满意;7-8:一般/不确定;6-7:不满意;0-6:很不满意),描述社区居民对社区生活满意的程度,进而探索影响居民生活感受的主要原因。

表1 满意的原因比重表

等级(比重) 原因	9-10 非常满 (36%)	8-9 满意 (37%)	7-8 一般/不确 定(13%)
生活富裕	30%	26%	14%
环境优美	79%	75%	78%
安定有序	61%	46%	36%
社会风气好	40%	28%	20%
社会福利好	33%	19%	8%

表2 不满意的原因比重表

等级(比重) 原因	6-7 不满意(6%)	0-6 非常不满意(8%)
生活压力大	60%	36%
居住环境不好	0%	6%
治安不好	8%	15%
缺乏人情味	20%	12%
社会风气不好	4%	33%
社会福利差	24%	48%

从问卷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来看,8-10 区间所占比重共计 73%,0-8 区间占 27%。也就是说,551 份问卷中 73%的居民满意(其中有近一半居民表示非常满意)现在的新型农村社区的生活。从问卷所调查的原因来看,9-10 区间满意的主要原因是环境优美(79%)、安定有序(61%)、社会风气好(40%);8-9 区间满意的主要原因也是环境优美(75%)、安定有序(46%)、社会风气好(28%);7-8 区间满意的主要原因同样也是环境优美(78%)、安定有序(36%)、社会风气好(20%)。由此可以得出,环境优美、安定有序和社会风气好是增加社区居民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再来看引起居民不满的原因分析,6-7 区间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压力大(60%)、社会福利差(24%)、缺乏人情味(20%);0-6 区间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压力大(36%)、社会福利差(48%)、社会风气不好(33%)。可以发现,在非常不满意的 0-6 区间和不满意的 6-7 区间,虽然不满意的程度不同,但是不满意的原因都集中在生活压力大和社会福利差这两个方面。所以,生活压力大和社会福利差是使社区居民对新型农村社区生活表示不满意的主要原因。

## 2. 家庭幸福指数分析

问卷中,家庭幸福设置了 10 个程度递增的指数,被调查的社区居民根据自身的感受,选择不同的指数来衡量家庭的幸福程度。文章在此将 10 个指数依然分为 5 个等级(9-10:非常幸福;7-8:比较幸福;6:无所谓;4-5:不幸福;1-3 非常不幸福),根据分析各自的比重来说明农民入住新型农村社区变为社区居民后家庭

的幸福程度。

表3 家庭幸福等级比重表

等级	9-10:非常幸福	7-8:比较幸福	6:无所谓	4-5:不幸福	1-3 非常不幸福
比重	52%	36.8%	4%	6%	1.2%

可以看出,551 个统计样本中,就家庭幸福指数的统计落在 9-10 区间的超过一半,加上落在 7-8 区间的 36.8%,7-10 区间占了 88.8%的比重。也就是说,有大多数的社区居民觉得目前的家庭幸福,甚至有超过一半的社区居民觉得非常幸福。

这个结果,在笔者对部分新型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走访中得到了印证。走访社区居民时多数见到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说明来意后他们十分兴奋的跟我们聊起现在的“新生活”。在辉县南李庄社区走访时,一位老大妈跟我们畅谈起现在的幸福生活。搬进新社区前,家里房屋破旧,两个儿子都在大城市打工,种田收入微薄等。大妈语重心长的说,生活清苦不算什么,以前再苦日子都过了,就是老人想儿子,孙子想爸爸,一家人难得有团员的时候。大妈家的情况在广大的农村具有普遍性。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打拼,留下的大多数是老人与儿童。“空巢现象”与“留守儿童”已成了农村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十室九空”、“亚公带孙”的现象已十分普遍。“一家三代,同居一屋,同聚一堂,同食一桌。”已成了乡村人们的一种奢望。于是老人孤寂失养,儿童无父母管教的现象已满目皆是。虽然现代经济发达,一日三餐不成问题,但是一家“四分五裂”,老人没有人照顾、孩子无父母在身边教养,造成各种缺失的问题,实在令人唏嘘感叹。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加剧,家庭结构的改变,大大弱化了家庭社会资本的作用。“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为了回馈乡里,河南孟电集团无偿援建了南李庄新型农村社区,各种配套设施齐全。2010 年底,南李庄 350 户村民全部入住新社区。孟电集团吸纳了当地的部分劳动力,又利用节约出来的土地建设了一个大型的建材市场,以解决社区居民的就业和致富问题。笔者走访居民了解到,大部分原来在外地打工的村民都回到家中,在附近的工业园区或者企业中打工。走访到的老人们都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子女都在附近上班,孙子孙女都在附近上学,看病不用出社区,环境优美,秩序井然。

相继调研的其他社区的建设情况虽然不同,但是从走访的居民对现在社区生活的描述来看,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对家庭社会资本有着重要的影响。新型农

村社区建设,既不能等同于村庄翻新,也不是简单的人口聚居,而是要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在农村营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促进土地节约、资源共享,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为了解决农民“失地不失业”的问题,发展产业和解决社区居民的就业问题也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题中之义。甚至有不少新型农村社区还建立了农民创业园,鼓励返乡农民自主创业,开辟致富道路。

著名学者厉以宁所倡导的告别“农民进城才是城镇化”的思维模式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中得到了验证,以新型农村社区为切入点的新型城镇化使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回流,不仅缓解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回归,使千万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重新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使得“老有所终,幼有所长”,解决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和老人的赡养问题。这也是微观层面上,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资本效应所在。

基于此,得出第一个命题:

命题一:新型城镇化通过产业带动,促使农民工返乡临近就业,具有显著的缓解“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资本效应。

### 3. 邻里和谐指数分析

问卷中,邻里和谐设置了10个程度递增的指数,根据上文分析家庭幸福的方法,在此同样分为5个等级(9-10:非常幸福;7-8:比较幸福;6:无所谓;4-5:不幸福;1-3非常不幸福),根据分析各自的比重来说明农民入住新型农村社区变为社区居民后邻里间的和谐程度。

表4 邻里和谐等级比重表

等级	9-10:非常和谐	7-8:比较和谐	6:无所谓	4-5:不和谐	1-3非常不和谐
比重	53.2%	34.7%	5.1%	6.4%	0.6%

可以看出,551个样本,9-10区间的比重超过一半,加上7-8区间,7-10区间的比重达到87.9%。也就是说,有87.9%的社区居民认为现在的社区生活邻里间的关系和谐。研究邻里和谐指数的用意是,邻里关系是目前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化的步伐,生活模式将以社区生活为主,告别独居、散居的生活,邻里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邻里关系甚至是一直社会资本,将对人们的生活、生产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文章研究新型城镇化社会资本效应中观层面的切入点。

### 4. 社区生活满意指数的回归分析

文章根据551份关于社区居民的调查问卷的内容,把家庭幸福指数与邻里和谐指数的平均数命名为社区生活满意指数,并依此为被解释变量Y,构建回归模型,来说明11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

表5 变量定义

变量	变量标识	变量定义
X1	社区所在地区	按照2012年河南省18个地市的人均GDP排名逆序对社区所在地进行编码,例如郑州市人均GDP排名为第2,实际编码则为17。
X2	年龄	等于1,表示居民年龄为20岁及以下;等于2、3、4、5则分别表示的居民年龄段为21-30岁、31-40岁、41-50岁、51岁以上。
X3	文化程度	等于1,表示居民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等于2、3、4分别表示高中、专科或本科、研究生及以上。
X4	现在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等于1,表示收入主要源于务农;等于2、3、4、5则分别表示收入主要源于土地租金、就近务工、外出务工、经商。
X5	搬入社区前的收入来源	等于1,表示收入主要源于务农;等于2、3、4则分别表示收入主要源于就近务工、外出务工、经商。
X6	是否适应社区生活	等于-1,表示完全不适应;等于0、1、2则分别表示不适应、已经适应、完全适应。
X7	社区生活	等于1,表示生活富足;等于0表示生活压力大。
X8	社区环境	等于1,表示社区环境优美;等于0则分别表示环境不好。
X9	社区秩序	等于1,则表示社区安定有序;等于0表示社区治安不好。
X10	社会风气	等于1,表示社会风气好;等于0表示社会风气不好。
Y	社区生活满意指数	1-10,10个等级表示社区生活的幸福度(该指数是家庭幸福指数和邻里和谐指数取平均值所得)。

表6 回归结果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系数	0.05	0.12	0.05	0.01	0.17	0.18	0.14	0.03	0.46	0.35
T统计值	33.22	13.74	3.65	4.91	25.03	18.11	10.52	2.15	23.47	21.47
P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3	0.00	0.00

由上表的结果看,社区秩序对社区生活满意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46,在10个变量系数中最大。其次是社会风气对社区生活满意指数的回归系数0.35。可见,社区秩序和社会风气对社区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社区秩序和社会风气都属于居民生活的外部环境,本质上这是群体中人际关系的一种氛围。我国农村人际关系具有传统的本土性,是建立在人伦之上,体现的是血缘与地缘的人际关系。在地缘关系上建立的邻里关系就是他们除血缘关系以外的重要的社会资本。邻里关系曾是社会关系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远亲不如近邻”,“千金买宅,万金买邻”,就是最好的写照。邻里社会资本的具体内涵是指乡村社区邻里之间在长期的日常生活的交往中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及其背后隐藏的信任、互惠,规范等。农民搬入新社区之后,生活的内在环境是主要是靠邻里关系来营造的。社区内安定有序,社会风气好是邻里关系和谐的体现,更是邻里关系和谐对居民生活环境产生的积极作用。

费孝通说:“邻里就是一组户的组合,他们日常有很亲密的接触并且互相帮助。这个村里习惯上把他们住宅两边各五户作为邻里。对此他们有个特别的名词,叫做‘邻里’。他们互相承担着特别的社会义务。”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改变了农村散居的生活状态,使人口

大量的聚集在一起,不在局限于村落的概念。在笔者实地调研的社区样本中,几乎所有的社区是采用村庄整合的方式聚集村民,已达到土地的高效节约和公共资源的高效利用。新社区内的村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村民自然融合,原来的邻里关系范围扩大,形成更加广泛的邻里社会网络。这些新的邻里社会资源通过邻里之间的相互的信任、互惠网络、规范等促进社区的稳定与发展。这就是中观层面上,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资本效应所在。

基于此,得出第二个命题:

命题二:新型城镇化通过拉近、扩展、强化邻里关系,增强了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互惠和规范作用,产生显著的社会资本效应。

#### 5.管理模式分析

从河南省工商联提供的50个新型农村社区样本和笔者实地调研的5个新型农村社区的资料中,可以发现所有的新型农村社区都配备了社区服务中心,有些社区直接命名为党群服务中心。建成入住的社区90%以上都成立了社区物业公司,专门负责社区的治安、卫生等。成熟的新型农村社区,例如2011年入住的辉县南李庄新型农村社区,不仅仅成立了专门的社区物业公司,在原来的村委会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社区居民,成立了社区管理委员会。一些刚刚发展起来的新型农村社区,例如即将完工的舞钢九龙山社区,虽然居民还没有入住,但是涉及的几个村庄的村委会就已经合并、整合成立了社区管理委员会,并颁布了社区管理的暂行办法。还有一些新型农村社区,尤其是那些整村改造而来的社区,由于保留了村庄的整体性,所以社区的管理还是由村委会承担。社区的卫生打扫、垃圾处理等服务,由村委会出资聘请专门的服务人员进行管理。

发展基层民主,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实行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以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有效途径,是社会主义民主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实践。“村民自治”制度从1987年开始试行,至今已历经26年,正式实施也有15年了。期间村民自治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从立法上看,国家政权机构到乡镇为止,未能直达村一级,作为群众行使“社会自治权”的基层组织的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只是“指导、支持、帮助”和“协助”的关系,但是实践中村委会和乡镇政府间更像是“隶属”关系。从权利范围上看,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具有组织领导、管理、宣传教育、服务及信息反馈的职能,但

实际情况是村委会“村务、政务”“一肩挑”,权利范围极其宽泛,形成了一些国家法律、司法、行政都难以进入“专制村”。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也必将涉及到农村行政体制的转变问题。通过这些样本的分析和实地访谈,可发现乡村的“村民自治”逐步向“居民自治”演变,“居委会”逐渐替代“村委会”成为实行基层民主的主要载体。河南许多地市相继出台了新型农村社区组织管理办法,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创新管理制度,建立新型农村社区党总支、社区服务管理委员会、社区监督委员会和社区居民代表委员等组织,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深化和完善。还可发现,新型城镇化还大大激发了村民维护自身政治权利的能动性。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农村土地政策的触及,打破了农村生活的惯性。土地流转、拆迁、补偿等一系列与村民利益高度相关的问题,冲击着“专制”的村民自治制度,激发了村民维权意识和监督意识。管理体制的转变加上村民主体意识的激发,真正地推动基层民主的建设步伐。这也是宏观层面,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资本所在。

基于此,得出第三个命题:

命题三:新型城镇化通过空间集聚,大大增加了居民的公共领域及其利益交叉,进而增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产生了基层民主管理的社会资本效应。

## 四、问题和政策建议

上文详细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资本效应,可以说新型城镇化不仅会改变中国农村的生活面貌,还会引起农村社会重构,对这些问题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 (一)新型城镇化务必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杜绝建设跟风问题

虽然河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一再强调要坚持分类指导,科学规划,群众自愿,量力而行,积极稳妥地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但笔者调研途中,到处可见正在建设中的大大小小的农村社区。由于国家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大力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为政府工作的新亮点。在基层工作中存在片面追求覆盖率、盲目推进的现象。而且许多社区规划没有前瞻性,土地资源浪费现象严重,配套公共设施简单。对此,笔者建议各级政府冷静看待新型城镇化问题,严把审批关口,正确引导,合理推进。

### (二)科学规划,落实宅基地复耕,确保土地节约

笔者调研途中所见不少新型农村社区多是低层独栋的建筑样式,公共设施简单,不过是以社区的名义

“群居”。笔者所调查的东屯社区居民上缴 1.6 万元就可以保留原来的宅基地。这种做法无疑是违背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初衷，新社区的建设不仅仅没有节约土地，还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对此，笔者建议，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的规划要有前瞻性和合理性，在保障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尽可能的节约土地；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大力监督落实土地复耕，严禁钻政策漏洞。

### (三)设置屏障、规避风险,保障农民生活的稳定性

新型城镇化把农民和企业牵连在一起,也把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转移给了农民。土地的流转使农民失去了相对稳定的生存保障,置身市场环境之中,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较低。近年来国际、国内的金融环境风云变幻,企业面临的战略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营销风险以及人事风险加剧,失业人数飙升。新型农村社区给农民和企业架起桥梁,双向互惠。一旦企业经营受到波动,依附企业生产的农民将首当其冲。笔者建议,对于农民来说,要谨慎流转土地,种地的收益虽然不高,但是风险小;对于企业来说,要制定长期的企业发展战略,谨慎投资,制度化经营,合理规避市场风险;对于政府来说,不仅仅解决“农民上楼”的问题,还有确保农民“失地不失利”。多渠道解决农民就业,大力支持农民创业,完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

### 参考文献:

[1] 李克强.推进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EB/OL].新浪网,(2013-01-05)[2013-07-28].<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

20130115/205514294798.shtml.

- [2] 卢展工.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农村发展的第二次革命[EB/OL].大河网,(2012-03-07)[2013-07-28].<http://news.dahe.cn/2012/03-07/101153965.html>.
- [3] 辜胜阻,李睿.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J].中国金融,2013,(4):17-19.
- [4] 陈锡文.城镇化主导因素是市场[N].中国证券报,2013-03-07.
- [5] 刘海平.新型城镇化内涵探析[J].决策探索:下半月,2012,(7):31-32.
- [6] 许经勇.新型城镇化有赖于户籍、土地制度改革同步推进[J].学习论坛,2013,(7):35-38.
- [7] 童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镇管社区”模式实践及其优化——面向城乡人口流动的大型居住区社会创新管理[J].兰州学刊,2012,(12):130-136.
- [8] 王小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1999,(9):22-29.
- [9] 杨波,朱道才,景治中.城市化的阶段特征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06,(2):34-39.
- [10] 潘海生,曹小锋.就地城镇化: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浙江小城镇建设的调查[J].政策瞭望,2010,(9):29-32.
- [11] 厉以宁.城镇化建设是民营资本最好的投资机会[EB/OL].新华网,(2012-05-24)[2013-07-28].[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5/24/c\\_112028371.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5/24/c_112028371.htm).
- [12] 庄聪生.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N].人民政协报,2013-07-17.
- [13]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2004,(3):136-146.

责任编辑:万东升

## The Social Capital Effect of New Urbanization

ZHOU Yangmin, LI Shuo, XUAN Huiyong

(Business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ew idea of new urbanization is put forward tha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ommunities will becom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idea above, the influence of new urbanization on farmers and country is studied by using the combined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and condi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ommunity in Henan province. At the micro level, industrial flow promotes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and finding job nearby, thus it can significantly ease the “empty nester”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problems. At the medium level, through narrowing, exten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neighborhood relations, the network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of trust, reciprocity, and normative role can be enhanced. At the macro level, through spatial agglomeration, the public and overlapped interests are greatly enhanced. Moreover, the sense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is strengthened. It is a new use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for the social hot spots and has a certain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are enriched, and the effects of China’s rural social reconstruction are reveale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the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ind new urbanization problems and improve the system.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new rural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